

北宋科甲同年关系 与士大夫朋党政治

BEISONG KEJIA TONGNIAN GUANXI
YU SHIDAFU PENGDANG ZHENGZHI

祁琛云◎著



四川大学出版社

北宋科甲同年关系 与士大夫朋党政治

LONG KEJIA TONGNIAN GUANXI
DAFU PENGDANG ZHENGZHI

祁琛云◎著



四川大学出版社

责任编辑:庄 剑
责任校对:陈月霖
封面设计:墨创文化
责任印制:王 炜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北宋科甲同年关系与士大夫朋党政治/祁琛云著

—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 2015. 3

ISBN 978-7-7561-8440-1

I. ①北…书 II. ①祁… III. ①进士—研究—中国—北宋

②知识分子—政治制度史—研究—中国—北宋

Ⅳ. ①D691. 46②D691. 7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066585 号

书名 北宋科甲同年关系与士大夫朋党政治

著 者 祁琛云
出 版 四川大学出版社
地 址 成都市一环路南一段 24 号 (610065)
发 行 四川大学出版社
书 号 ISBN 978-7-5614-8440-1
印 刷 郫县犀浦印刷厂
成品尺寸 148 mm×210 mm
印 张 14
字 数 373 千字
版 次 2015 年 3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5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38.00 元

◆读者邮购本书,请与本社发行科联系。

电话:(028)85408408/(028)85401670/

(028)85408023 邮政编码:610065

◆本社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
寄回出版社调换。

◆网址:<http://www.scup.cn>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基金项目

2013 年度河南省教育厅人文社科
重点研究项目

黄河文明传承与现代文明建设河南省
协同创新中心支持计划

河南省高等学校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团队
“宋代历史文化”支持计划

2012 年度河南省博士后基金项目

并承蒙河南省教育厅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
河南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资助出版
特此致谢

序 言

今有同窗之好，古有同年之谊，从古至今，因科论交、缘学成友是仕宦之间拓展社会交往的重要途径。同榜及第的进士同年关系是科举时代的产物，它既是仕宦之间赖以交往的一种途径，也是促成唐宋以降仕宦频繁结党与结社的一种因素。这种因科考结成的人际关系，为我们提供了观察唐宋以降历朝历代朋党政治的独特视角。它不仅是了解士大夫阶层社会交往的很好门径，也是考察当时政治文化的重要窗口。宋代社会相对松散，社会流动性大增，门第的庇护既已失色，更兼寒素登第者不在少数，寻求可以引为奥援的关系则成为必然的选择。在“举世重交游”（范质《戒儿侄八百字》）的时风中，同年关系自然更不会被忽视，“同年录”的出现显示了宋代社会的这一流行色彩。

朋比联党是古代士大夫政治的一大特征，从两汉到明清，虽然时移世易，朝野士人构党的热情却似乎少有改变，只是时代的变迁，其联结朋党的方式与途径有所不同。科举制度下的同年关系是士宦社会关系的重要层面，其产生的作用或影响难以一言概之。唐代缘科举而出现的师生关系、同年关系一度成为新兴官僚集团结党自固的重要途径。在党争风起云涌的北宋政坛，“朋党”问题尤为突出，欧阳修为“君子党”正名的名篇《朋党论》正是这一现象的产物。随着政治环境的变异，科场师生、同年等关系对朋党的影响虽然有所减弱，但其间与同年政治的关系，则需仔

细分析。作为导致党争激化的间接或隐性因素，进士同年关系之于士大夫朋党政治的影响始终是存在的。从宋仁宗前期的景祐党争和庆历新政，到神、哲时代的新旧党争，几乎每一次重大的政争都有同年构党之嫌。琛云的著作以个案研究为基础，深入地揭示北宋进士同年与朋党政治的关系，对于北宋政治文化的研究颇有参考价值。

琛云的著作是在博士论文的基础上修订而成的，比答辩时的质量又出彩不少。论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做了许多延展性的探讨，展开了许多前人少谈或未曾涉及的话题。作者观察到，从唐宋到明清，人们对进士同年关系的认知不尽相同，进士同年关系在北宋朋党政治与士林社会中的作用与影响也不尽相同。众多个案研究所揭示的士人群体、人事关系、政治斗争、诗文唱和等都从不同的侧面折射出北宋一朝士大夫朋党政治复杂多变的特点，也显示出作者试图以进士同年关系为切入点，从整体上把握北宋的政治文化特性。从解读进士同年关系在人际交往中的作用及其价值取向的运用来看，展现了作者结合中国传统伦理观念及当代西方社会学的相关理论的努力，具有新意的论述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顾炎武较早注意到了“同年关系”对朋党的政治影响，对这种关系带来的“私恩结而公义衰”的后果表示了忧虑（《日知录·同年》）。20世纪的学术界也关注到这个问题，然而论著稀少。40年代，陈寅恪先生在分析唐代牛李党争时认为，科举制度所衍生的座主门生及同年关系对唐中后期的党争起着重要的推动作用（《唐代政治史述论稿·政治革命及党派分野》）。90年代中叶，香港学者何冠环先生在其《宋初朋党与太平兴国三年进士》一书中讨论了几位出身于宋太宗太平兴国三年榜的政治人物通过同年关系结党的史实。琛云博士《北宋科甲同年关系与士大夫朋党政治》这本厚重的专著出版，无疑将这一领域的研究推向了

新的阶段。

科举制度在宋代有了很大的发展变化，每榜录取人数数倍于前朝，然而在史籍中却缺少关于进士同年的集中记载，琛云博士搜集整理了文献中的各种碎片化信息，对这一论题力求做出相对全面、深入且具有创新性的研究，取得了显而易见的成效。从叙事行文来讲，艰涩难读已成为史学著作的一大通病，如何将作品撰写得流畅而不失研究本意，则是学界共同关心的话题。作者希望重拾史学叙事文质并重的传统，在兼顾学术性与可读性方面做了许多努力，这也是本书的一个亮点。

“同年关系与朋党政治”这一课题牵扯面广，内容庞杂，研究起来具有挑战性。尽管琛云博士的书稿已经对许多问题做了不同程度的探讨，但无疑仍有可供拓展的空间。从时间的维度而言，可以顺延至南宋时期；就内容的广度而言，可以将研究领域向普通科举士人群体扩展。如果说，顾炎武对因科举而结成的某种关系的看法大体是负面的，那么，同年关系所造成的“消极”影响在宋代的情况到底如何？或许是读者有所期待的。

琛云勤奋质朴，事业有成，对母校怀有很深的感情，毕业六年之后，将长期思考并修订后的博士论文交给母校出版，作为老师，自然十分高兴。欣然作此序文，愿与琛云共勉！

刘复生

2015年2月初

目 录

绪 论	(1)
第一章 宋人的同年观念及其对同年关系的认同	(30)
第一节 宋人的同年观念	(32)
第二节 北宋士大夫对同年关系的认同	(45)
小 结	(63)
第二章 同年会与诗唱和	
——北宋同年进士交往的重要方式	(68)
第一节 唐宋进士同年会	(69)
第二节 诗歌赓唱——以王禹偁与同年唱和为例	(85)
第三章 朋比与年谊	
——北宋同年进士间的荐举与互助行为	(99)
第一节 北宋同榜进士间的荐举与朋比行为——兼析唐代 同年进士的朋党之迹	(100)
第二节 年谊与北宋同年进士间的互助行为	(129)
第四章 进士同年关系与士大夫朋党政治	(145)
第一节 同年关系与北宋景祐朋党事件	(145)
第二节 二宋、郑、叶同年关系与“庆历同年党”事件	(157)

第五章 同年交游与士人朋党

——立足于欧阳修、苏轼与同年进士交游关系的
考察…………… (179)

第一节 欧阳修与同年进士的交游及其政治影响…………… (180)

第二节 苏轼的同年关系与北宋后期的党争…………… (254)

小 结…………… (344)

第六章 同年世交

——北宋进士同年关系的延伸…………… (347)

第一节 士大夫与同年子弟之间的交往关系——以苏轼
与同年子侄交游为主…………… (349)

第二节 同年子弟之间的交往关系——以王、范、谢氏
兄弟间的交游为例…………… (381)

余 论…………… (401)

参考资料…………… (414)

后 记…………… (433)

绪 论

一、选题缘起

科举是隋唐以来对中国古代社会影响最大的制度之一，因此，一直以来，科举都是人们关注的热点问题，有关科举制度的论著层出不穷，研究的范围几乎囊括了与科举有关的所有论题。然而，与科举制度紧密相关的进士同年关系，却很少有所涉及。著名的科举史学者刘海峰教授在 21 世纪初曾指出：“就同年进士的关系作政治学研究，目前仅有何冠环于一九九四年在中华书局出版的《宋初朋党与太平兴国三年进士》，除此以外，对中国历史上七百二十五次进士科榜多数未曾作过同年关系的研究。至于明清乡试举人榜，材料更多，更是无暇顾及。”^①十多年过去了，这种情况并未有明显改观。进士同年关系不被学界重视并不等于其在历史上无足轻重，相反，在科举时代，同年关系是一种十分重要和有着相当影响的人际关系。这一点从“同年”一词在古代社会中适用范围的变化方面就有所体现，如在科举制度出现之前的时代，“同年”一词普遍用作同龄的代名词，在隋唐以来的科举时代，“同年”则成为同榜进士之间的专用称谓，而用“齐年”“同甲”等词代指同龄之人。称谓方面的细微变化足以反映同年

^① 刘海峰《科举文献与“科举学”》，《台大历史学报》第 32 期，2003（12）。

关系在科举时代的重要性。

鉴于此，本书在对北宋进士同年关系进行整体考察的基础上，将着力对同年关系与北宋政治及社会之间的互动关系加以探讨，在一些问题的论述中，将上溯至唐代。本书无意渲染或夸大同年关系在社会生活及政治事件中的作用与影响，而是力图通过对史料的考辨与分析，勾勒出北宋同年关系的本来面貌及特点。

二、同年关系介绍说

1. 同年之谓

所谓同年，即指科举时代同榜录取的进士。从科举史的角度出发，同年是专门表征进士之间同榜关系的一种称谓，同榜进士除了互称为同年外，还以年兄、年丈等相称。如苏轼在《贺彭发运启》一文中称同年彭次云为“发运吏部年兄”^①。据陈曦钟先生考证，明代同榜进士之间多互称“年丈”，并列举明人钟煜在其文集《隐秀轩集》中多称同年为“年丈”。^②

另外，史料中常将同年称为“同年生”，如《宋史·臧丙传》载：丙太宗时知辽州，“与监军不协，一夕割刃于腹而死，事可疑”，“同年生冯汝士以秘书丞知石州”，为言于朝，“乞按治”。^③按臧丙与冯汝士皆宋太宗太平兴国二年（977）进士，“同年生”即为“同年”之别称。

在文献中，“同年”除了表示科举同榜进士间的关系外，还有以下几种含义：

①（宋）苏轼《苏轼文集》卷39，曾枣庄、舒大刚主编《三苏全书》12册，287页，语文出版社，2001年版。

② 陈曦钟《释“年丈”》，《周一良先生八十生日纪念论文集》，438~442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明人称同年为年丈补证》，《学习与探索》，1997（1）。

③（元）脱脱《宋史》卷276《臧丙传》，9398页，中华书局，1977年版。

其一，表述时间之术语。将“同年”一词用来表示时间，不仅是今人的习惯，古人也是如此。如《史记》卷6载：“试使山东之国与陈涉度长絜大，比权量力，则不可同年而语矣。”^①

其二，用于指同龄之人。如《资治通鉴》卷61载：孙策“年十余岁，已交结知名。舒人周瑜与策同年，亦英达夙成。”^②按孙策与周瑜同生于公元175年，这里的“同年”即同龄之意。又如《晋书》卷77载：“顾悦之字君叔，少有义行。与简文同年，而发早白。”^③此“同年”亦同龄之谓。同年用以代指同龄多在隋唐以前，科举制度出现以后，“同年”一词专门用于指同榜进士，为免混淆，时人用“齐年”“同甲”等词代称同龄之人。《旧唐书·武元衡传》载：“始元衡与（李）吉甫齐年，又同日为宰相。”^④这里的“齐年”即指同龄。宋人也经常以“齐年”代指同龄，史载熙宁中王安石第一次罢相，吕惠卿当政，“发其私书，其一曰：‘无使齐年知。’齐年者，为冯京也。京、安石皆生于辛酉，故谓之齐年。”^⑤南宋人楼钥在为其堂妹撰的墓铭中称其妹与他生“齐年而后一月”。^⑥明人祝允明在好友李浩的墓志中称李浩夫人生“与公齐年，诞稍迟”。^⑦可见，在科举时代，“齐年”一词替代了“同年”而成为表示人们之间同龄关系的常用词。除了称同龄为“齐年”外，有时还用“同甲”代称同龄，如

①（汉）司马迁《史记》卷6《秦始皇本纪》，282页，中华书局，1959年版。

②（宋）司马光《资治通鉴》卷61汉献帝兴平元年十二月，1957页，中华书局，1976年版。

③（唐）房玄龄等撰《晋书》卷77《顾悦之传》，2048页，中华书局，1974年版。

④（五代）刘昫《旧唐书》卷158《武元衡传》，4161页，中华书局，1975年版。

⑤（明）杨士奇《历代名臣奏议》卷177。

⑥（宋）楼钥《攻媿集》卷105《从妹楼夫人墓志铭》。

⑦（明）祝允明《怀星堂集》卷17《李公夫妇合祔志铭》。

宋神宗熙丰年间，在洛阳赋闲的文彦博等人举办同甲会，以贺同生之喜，史载：“文潞公保洛日，年七十八，同时有中散大夫程珣、朝议大夫司马旦、司封郎中致仕席汝言，皆年七十八、尝为同甲会。”^① 总之，在科举时代，“同年”不再有同龄之意，而专门用来指进士间的同榜关系。

2. 从“同年”的适用范围及同年录的修撰看同年观念的历史变迁

从唐宋到明清，同年的内涵在不断发生着变化。唐时，凡参加礼部主持的省试且及第者均互称同年，另外在唐代，同举制科者也称同年。宋代自太祖创立殿试制度以来，只有参加由皇帝亲自主持的殿试并赐及第者方互称同年，参加省试或殿试而被黜落者与及第者只叙场屋之旧，不讲同年之谊。另外宋代制科取士甚少，且不常设，一度对唐代党争产生影响的制科同年在宋代很少被提及。到了明清，“同年”一词的适用范围被扩大，不仅殿试及第者互称同年，共同参加过乡试（宋时的州府解试）、会试（宋时的省试）的士子亦互指为同年。

明清之际不仅同年称谓的适用范围扩大，而且，作为叙同年之谊的依据，各种同年录也大量出现。现藏于国家图书馆的上百件明清时期所修的各种同年录几乎将科举制度中各个层次的考试都涵盖了。如《嘉靖癸丑科进士同年便览录》《康熙二十一年壬戌科同年序齿录》《道光二十四年甲辰科进士同年录》等均是为殿试及第进士所修。不仅正式及第进士有同年录，就是尚未正式及第的会试贡生乃至乡试举人也纷纷修同年录以志纪念，如《道光二十年庚子科会试同年齿录》《光绪六年庚辰科会试同年齿录》《乾隆四十八年癸卯科江南乡试同年齿录》《同治元年壬戌恩科山

^①（宋）江少虞《宋朝事实类苑》卷24，290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

西乡试同年齿录》等即是此类。不仅正式的科举考试考生修有同年录，就连在清代泛滥的拔贡、恩科等非正式的人才选拔活动在事后也修同年录，如《雍正二十三年寅卯拔贡同年序齿录》、《光绪三十年甲辰恩科会试同年齿录》等。人们对于同年录的偏爱并没有因科举制度的废除而改变，现藏于国家图书馆的几件民国时期修的同年录就是明证，其中一件是1936年由南京国民政府主办的第三届高等考试同年会，会后修《同年通讯》录作为纪念。另一件是1946—1947年间举办的民国17年（1928）外交官考试同年会，会后编有《会员通讯》录。这里的《同年通讯》《会员通讯》等其实就是同年录。

同年录实际上就是同榜进士个人简介的汇总，是同年关系存在的文字依据。从现存于《四库全书》中的《绍兴十八年同年小录》可以看出，同年录一般包括两部分内容：第一部分是对及第进士的姓名、及第名次、籍贯等略做介绍，相当于题名录，如在介绍该榜进士朱熹时称：“朱熹，第五甲第九十人，建州建阳县群玉乡三桂里，祖居徽州婺源县。”第二部分的介绍较为详细，“第五甲第九十人：朱熹，字元晦，小名沈郎，小字季延，年十九。九月十五日生……曾祖绚，故不仕，祖森，故赠承事郎，父松，故任左承议郎，本贯建州建阳县群玉乡三桂里，自为户。”^①这一部分是朱熹本人及祖宗三代基本情况的介绍，类似于个人小档。整个同年录更像是政府为了掌握即将入仕的新科进士的基本情况而编修的个人档案，只不过是将其汇总成册而已。从探究同年关系的角度出发，这样一份档案性质的资料的研究价值并不大，毕竟同年关系刚刚成立，同年之间还没有建立真正的关系，这样的同年录不能显示同年交往的情况，它只是同年关系进一步发展的依据。完整流传下来的宋代进士同年录只有《绍兴十八年

^①（宋）不著撰人《绍兴十八年同年小录》。

同年小录》和《宝祐四年同年小录》两种，四库馆臣在《绍兴十八年同年小录》提要中称：“宋代《同年小录》今率不传，惟宝祐四年榜以文天祥、陆秀夫、谢枋得三人为世所重，而是榜以朱子名在五甲第九十，讲学家亦递相传录。”正如馆臣所言，这两种同年录得以传世，不是因为时人重视同年关系所致，而是该榜中有对当世有着重大影响的人物的缘故。可见此类官修同年录既不能反映当时人们的同年观念，对我们今天进行同年关系研究的参考价值也十分有限。宋代官修同年录难以体现同年观念，而像明清时期大量出现的同榜进士为了增强同年友情而私下修撰的同年私录在有关宋代的文献中却难觅其踪，这在一定程度反映了两宋与明清时期人们在同年观念方面的差异。

与两宋鲜有私修同年录的情况不同，明清时期，不仅朝廷修有登科录，各级考试后，考中者多私修同年录，一般称为同年齿录、同年便览等，上面列举的明清时的各种同年录便多为私人所修。学者钱茂伟称：“登科录与同年齿序录都是廷试后编撰的，但性质完全不同。登科录是政府颁布的按成绩编排的进士名录，又称‘公录’；而齿序录则是进士私下按年龄编撰的名录，又称‘私录’。”^①“公录”与“私录”的最大区别在于：“公录”以名次排序，显示科举及第的高下次序；“私录”以年龄为序，体现了长幼有序的兄弟之情。正如明人刘节所言：“公录详制，私录详事；公录重礼，私录重情。”^②以年龄为序，将手足之情引入同年关系，从而加深同年感情，是“私录”的最大特点与主要功能。明人孙承恩说：“试录之刻，惟以名次为序，而弗论其齿，则少长错置，谓之弟兄也弗协。兹诸君子所以惓惓于齿之叙也。

^① 钱茂伟《国家、科举与社会》，255页，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4年版。

^② （明）刘节《宝制堂录》卷下《同年录序》。

惟齿之叙，则长长而少少，真弟兄。”^①

这种以年龄为序的同年齿录被视为是增强同年关系的重要工具，孙承恩在《同年录序》中称：“惟古云同年有昆弟之义，夫萃异姓于一时，何谓昆弟也？而致其义欲如昆弟，则兹录之为也。”认为只有通过修撰同年录才能真正获得兄弟般的友谊。由于同年录有助于增进同年感情，所以士人屡修而不厌其烦。他接着说：“是故乡录惟其名，私录惟其齿，齿同者叙其月，月同者叙其日，合而观之，长幼秩秩，则百三十五人者，真昆弟若矣。匪直是也，具地具业即乡录也，具世具行即殿录也，不厌其重复，不嫌其赘琐，而着其号，列其子，则又二录之所无者，必欲申郑重恳到之意。凡可以维持而系属、而联络，俾无至于忽忘者，无不用其志，虑远而谋悉，谊笃而情真，将俾家藏而世讲焉。兹录之用意不其厚哉！”^② 时人崔铤在《乙丑同年便览录序》中也强调了同年录之于同年关系的重要性，他说：“同年有世讲之义，自吾之身而即忽且忘焉，至薄也。过其里庐而若罔知途之人也，以同年流而为途人，其可悲也已。是故开卷之际，存者没者。升与沉者，感其所遇之异而吾则无异视也，率吾党而敦友道者，必是录矣。”^③

明人对同年录的重视与商品经济的兴起有一定的关系，随着商品经济的勃兴，在金钱的诱惑下，社会上见利忘义的现象越来越多，一些有见识的士大夫主张通过修同年录等活动来加强联系、增进友谊，进而敦厚风俗，以期改变整个社会的风气。韩邦奇称：“夫乡试有录矣，复录此者，存厚也。宋儒有言，士以忠厚为本，厚者，万善之基，百行之首也。是故厚于国者，臣之忠

①（明）孙承恩《文简集》卷30《嘉靖丁未齿叙录序》。

②《文简集》卷30《同年录序》。

③（明）崔铤《洹词》卷1。

者也；厚于家者，子之孝者也。是录也，诸君子朋友之厚者也，朋友且厚矣，而况于国乎？况于家乎？”^①

总之，同年称谓适用范围的扩大及同年录的广泛修撰，反映了明清之世同年观念已深入人心，同年关系得到了普遍的认同，其被认同的广度及深度都远远超过了唐宋时期，从而也对当时的社会与政治产生了更大的影响。

3. 从传统的朋友观念出发解读同年关系的价值取向

按古代社会人际关系的归类标准，同年关系应属于朋友关系的序列，朋友关系虽位列“五常”之一，但却是五种基本人际关系中最边缘化的一种，它既没有父子、夫妇、兄弟之间的亲情关系，也没有君臣之间的利害关系。朋友关系既不是先天固有的，也不是后天强加的，是交往双方为满足某种需求而自愿结成的，它是一种若即若离的关系，与君臣、父子、夫妇、兄弟这些一旦形成就长期固定存在的关系不同，朋友关系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交往双方在心理上的认同感，一旦不再认同，朋友关系将会自动解除。宋人王回在《告友》文中说：“古之言天下达道，曰君臣也，父子也，夫妇也，兄弟也，朋友之交也。五者各以其义行而人伦立，五者义废，则人伦亦从而亡矣。然而父子、兄弟之亲，天性之自然者也。夫妇之合，以人情而然者也。君臣之从，以众心而然者也。是虽欲自废，而理势持之，何能斩也？惟朋友者，举天下之人莫不可同，亦举天下之人莫不可异。同异在我，则义安所卒归乎？是其渐废之所繇也。”^②

王回在这里对中国古代最重要的五种人际关系加以分析，认为朋友关系最为松散，凝聚力最弱，最易破裂。同年关系则是一种没有感情相维、利害相系的纯粹的朋友关系，赖以维系的是同

①（明）韩邦奇《苑洛集》卷1《北畿乡试同年叙齿录序》。

②（明）冯琦、冯瑗等编《经济类编》卷83。